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1789年风云录

〔法〕 米歇尔·维诺克 著

侯贵信 孙昆山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789, L'ANNÉE SANS PAREILLE

Michel Winock

Société le Monde/Editions Orban 1988

根据世界报出版公司和奥尔邦出版社1988年法文版译出

Copyright (c) 1988 par La Société le Monde
et Les Editions Orban

责任编辑：方 平 许淑珍

封面设计：王麟生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1789年风云录

[法]米歇尔·维诺克 著

侯贵信 孙昆山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9.5 字数：237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2-0239-7/D·30 定价：4.00元

出版说明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彻底最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200年来,各国历史学家对这次革命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深入研究,出版了卷帙繁浩的论文和著作,不少国家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许多学者为此付出了毕生精力。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已超出历史学范畴,成为研究法国18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项专门学问即“法国大革命学”。由于立场、观点等方面的差异,人们对这场革命的背景、起因、性质和影响众说纷纭,出现了众多不同的论文和学派。例如,前后就有“意识形态革命论”,“政治革命论”,“经济革命论”,“社会革命论”,“大西洋革命论”和“西方革命论”等说法,也出现了“传统学派”,“年鉴学派”和“大学讲座学派”等流派。

本书作者没有陷入错综复杂的学派争吵。他另辟蹊径,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按事件的编年顺序,以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之间的斗争为线索,描述了1788年6月至1789年12月(主要是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些描述比较客观,既避免了“抒情派”历史学家一味强调革命的辉煌伟大而忽略其不足的倾向,又克服了“否定派”历史学家只见暴力流血,不见革命的深远意义的片面性。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评述不拘一格,博采众长。但是总的说来,书中的描绘多于议论,作者尤其没有长篇累牍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然而,读者读完本书后,却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这一场革命,绝不是偶然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法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它的语言生动活泼。书中再现了大革命

中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场面，如瓦块战斗日，雷韦荣事件，三级会议开幕，网球场宣誓，攻占巴士底狱，大恐慌时期，雅各宾派的诞生等等。作者还用幽默的笔法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穆尼埃、内克、米拉波、西哀士和罗伯斯比尔等众多历史风云人物。这使本书不同于艰深的学术著作或排比史料资料书，而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本书原是法国《世界报》为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而连载的。承蒙原出版者和作者同意，并且得到法国外交部帮助，我们将此书译出，用以表达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敬意。希望中译本的出版能对中国读者了解200多年前爆发的这场伟大革命有所裨益。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侯贵信、孙昆山、郑业奎、赵立兴、谢燮禾、夏煌、宋敬武、龚元兴、王晓渡、杨广玉、王学红、高虹、王燕、张红梅。全书由侯贵信统校。

书中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目 录

一、瓦块战斗日	1
二、维济耶精神	8
三、洛梅尼·德布里安下台	15
四、“三十人协会”与公众舆论	23
五、显贵们的失败	31
六、“第三等级是什么？”	38
七、饥民登上历史舞台	45
八、选举	52
九、“祖先的呼声”	59
十、雷韦荣事件	67
十一、三级会议开幕	74
十二、三级会议踏步不前	82
十三、西哀士发出勒令	90
十四、国民议会诞生	97
十五、网球场宣誓	104
十六、国王的反扑	112
十七、宫廷的战略退却	119
十八、内克被解职	126
十九、武装起来的巴黎	133
二十、攻占巴士底狱	140
二十一、“助朕一臂之力！”	147

二十二、国王与三色帽徽·····	154
二十三、阿图瓦伯爵流亡，内克复职·····	161
二十四、大恐慌时期·····	168
二十五、8月4日之夜·····	175
二十六、子弹呼啸，国库空虚·····	182
二十七、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189
二十八、否决权、右派和左派·····	196
二十九、第四权力诞生·····	203
三十、“鱼贩子”进军凡尔赛·····	211
三十一、国王被押回巴黎·····	219
三十二、巴黎——名副其实的首都·····	226
三十三、雅各宾派的诞生·····	234
三十四、两类公民·····	242
三十五、一颗定时炸弹：教会财产收归国有·····	249
三十六、行省的设立·····	256
三十七、上演《查理九世》之争·····	263
三十八、法国人重新团结起来·····	271
三十九、革命在欧洲·····	278
四十、不平凡的一年·····	286

一、瓦块战斗日

（1788年6月7日）

王权强令格勒诺布尔大理院接受它制定的法律，大理院的法官们则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一场叛乱迫在眉睫。庶民们（手工业行东、小业主、农民、帮工和流浪汉）站到了法官们一边，在暴动者与王军的激烈冲突中，不少人伤亡。“那一天，我目睹了法国革命引起的第一次流血事件，”司汤达^①这样追忆道。至于多菲内省的法官，他们则尝到了带有苦涩滋味的胜利：难道不是他们把事情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吗？

我们不能禁止提出这样的问题，虽然提问者有可能被耻笑为幼稚：革命究竟始于何地何时？众所周知，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经历的任何一场动乱，如同法国在18世纪最后12年所经历的那场动乱一样，都不会是由单一事件引发的，尽管这一事件可能十分具有爆炸性。人们决不会象赛场上的运动员在听到裁判的枪声后立即冲出起跑线那样，仅仅由于某一事件的发生就去围攻旧世界。尽管如此，即使作为象征，我们依然应该记住那个火热年代里的这一天——它独具光辉，如同幕启之前的一声长铃，宣布一场暴风骤雨的来临。

那是1788年6月7日，格勒诺布尔市。司汤达在其著作《亨利·布律拉尔的一生》中曾经谈到，这一天（“瓦块战斗日”）是他

^① 司汤达（1783—1842），法国著名作家。

童年时代记忆犹新的事件之一。未来的作家当时叫昂利·贝尔，只有5岁，刚刚开始祖父家里学习最基本的常识。“那一天，”他写道，“我目睹了法国革命引起的第一次流血事件。”

其实，“革命”一词并不适用于源于社会深处、后来导致统治制度被推翻的那场运动。相反，它指的是王国政府决定实施的使全国为之震惊的最新改革措施，即所谓的“五月敕令”。无论如何，当时多菲内省的首府在若干天里领导了全国抗议浪潮，并且成为政府代表同一致支持并进而率领受到威胁的大理院的人民群众之间反复较量的战场。

从14世纪以来，大理院（指巴黎和外省的高等法院）对国王发布的特许证和法令有权进行登记，然后通告下一级法院。不言而喻，从15世纪开始，大理院的法官们即养成了讨论国王的敕令，甚至拒绝给予登记的习惯。因此，法官们已经不只是简单的高等法院，他们拥有的谏净权赋予了他们政治权力。因此，王国政府同负责确认法律的穿袍贵族之间的冲突绵延不断，进行了几个世纪。

法官们援引古代法律条文，借助拥有的特权，处处树立自己的权威，从而限制了专制制度的发展。此外，1614年以来三级会议迄未召开，法官们自认为他们的讲话即是人民的声音。原则上讲，他们由国王任命，但事实上，他们的职务是终身的，这是因为陷入困境的法国君主制度竟然一贯拿法官职务做交易。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当一名法官或法庭庭长，如同当一名公证人或税务官一样轻而易举。更有甚者，在完税后，法官职务便成为世袭。当然，国王本可以出钱赎买，然而由于国家财政已经岌岌可危，国王便无所作为了。

这些子继父业的法官们受人仰慕，社会地位显赫，在巴黎他们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外省他们也有雄厚的势力；他们在国内享有世代相传的权威，最终势必与国王分庭抗礼，争夺立法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王本人坚强有力，深孚众望，享有民心，他

在同穿袍贵族的较量中一定可以占据上风。但是，如果国王年幼，不能自主，受贪婪的摄政王、嫉心十足的太后和满朝阴谋家所左右，那么大理院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路易十四去世后的摄政王为了不执行已故国王的遗嘱，不求助于大理院还能求助于谁呢？于是，大理院迫不急待地进行了裁决……作为交换，法官们从此不再是被太阳王^①的阳光灼伤了的装璜门面的人物：他们重新夺回了提异议权。

作为真正的民主派，我们对此是可以拍手叫好的。因为这不正是自由制度的开端，或者按孟德斯鸠的说法，是人们希望的“以权制权”吗？然而，这些以人民代表自居的法官们毫无社会基础可言，他们是一批地地道道的以贿赂得官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集团利益，他们往往不支持国民希望进行的改革。我们尤其可以想见，这些无一例外出身贵族的法官们是决不希望改变重压在平民头上、赋税负担不平等现象的。所以，一旦政府决心让富人掏掏腰包，取消某些过于明显的特权，按新的课税基数征税，站在它前面的拦路虎会是谁呢？显而易见，是大理院的法官们！政府要改革司法制度，打击法官吗？此种改革方案必然激怒法官，他们会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反对专制主义。

政府确曾与法官们进行过对抗。只要持有密札^②，就可以把死硬的法院院长或者顽固不化的推事流放；也可以把法官停职、调离、逮捕。例如，1770年莫普^③（一位办事果断的掌玺大臣）就曾进行过司法制度的改革，逐步制服了大理院。然而这一勇敢的举动最后仍以失败告终：4年以后，软弱无能的路易十六屈从压力，御令恢复原状。尔后，历史再一次重复：只要政府决心解决严重的财政问题（引发大革命的导火线），它提出的税制改革

① 指路易十四。

② 密札是国王颁发的捕人密令，持有密札即可不经审讯把拘捕的人投入巴士底狱。

③ 莫普（1714—1792），法国大法官。

计划就必然遭到法官们的反对。1787年，大臣卡洛纳^①设想制定新的课税，以打击特权者。为此，他试图召开显贵会议，想以此挫败反对派。结果是枉费心机，卡洛纳本人被迫引退。

国家开支无度，入不敷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它再也不能回避改革问题了。可是巴黎和各省大理院顽固拒绝登记有关法令，其中就有土地征税法案。对此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1787年8月，再次发生摩擦：巴黎大理院被强令迁到特鲁瓦，波尔多大理院被勒令搬到利布尔纳。于是，有人建议召开三级会议，法官们很快把这个主张接了过去。法官与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进一步激化。为了防止发生最坏的情况，巴黎大理院于1788年5月3日公开发表了关于“王国基本法”的声明，重申通过征收献纳金的权力属三级会议；声明抗议任意捕人、监禁，表示支持法官终身制以及外省习俗与特权的不可侵犯性。

国王看到自己的绝对权力受到了公开挑战，决心解决危机。在首席大臣洛梅尼·德布里安^②的建议下，国王面对这一被称作“政变”的举动没有退让：他要对司法机构动大手术，铲除第二政权大理院。德布里安说服掌玺大臣同意了自己的主张：要解决财政问题，非改革税制不可；而要进行改革，必先削弱大理院的权力。软弱的路易十六最后也接受了这一强硬立场。当心！尽管没有任何人希望如此，革命的车轮即将开始转动。

5月初，在格勒诺布尔，有消息说多菲内省大理院及其它大理院要对几项敕令进行登记，但是敕令的内容尚不得而知。在格勒诺布尔，代表中央政权的是司法长官德克莱蒙—托耐尔和总督卡泽·德拉博韦。正是他们负责向大理院首席院长德贝吕勒送达需要登记的敕令，同时传达御令，禁止进行任何讨论。一些大理院为之震惊，他们仿效巴黎大理院签署了抗议书；而巴黎大理院

① 卡洛纳（1734—1802），法国国务活动家，曾任财政总监。

② 洛梅尼·德布里安（1727—1794），法国大革命前的神职人员，曾任财政大臣。

因为进行抗议被强令立即“休庭”。5月9日，预定进行登记的前一天，格勒诺布尔大理院即提前宣布那些可能以“违反规定的程式”强加给大理院的法律无效。

翌日，在大理院主要法庭隆重举行会议，德克莱蒙—托耐尔公爵、卡泽·德拉博韦总督以及36位法官、庭长和推事在德贝吕勒的主持下出席会议。国王特派员重申禁止讨论。法官们气焰十分嚣张。他们拒绝就座，并且不顾命令，退出会场，来到旁边的一个房间，在那里等待需要很长时间方可完成的法令登记和发表程序。凌晨5点钟，一切手续完毕。看门人从司法长官手中拿到钥匙，并被要求把法院各个大门紧紧关闭。

那么这些敕令针对什么呢？主要是打击大理院的权力。首先，通过改组司法机构，设立新法庭，削弱贵族法院的作用，大大削减大理院的职能。通过减少大理院审理的案件，降低大理院法官的地位。这一切意味着法官的职业受到了威胁，他们将失去自己的特权。第二，尤为严重的，政府剥夺了大理院的提异议权。在1792年三级会议召开之前，设立“全权”法院，该法院由“国家前两个等级中挑选的人员”组成，掌握对各项法律的审核、谏诤和登记权。

敕令公布之后，立即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庭长和推事们，除了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外，还使一大批法院工作人员，包括检察官、律师和传达员等得以谋生。此外，法院周围进行着多种职业活动，一份“致国王请愿书”这样写道：“格勒诺布尔市民生活的依靠，手工业者和商人谋生的手段，这一切是由大量的办案人员、定居在这里的法官以及为参加诉讼案件从多菲内省各地乃至外省来这里的外地人的消费提供的，而这些案件的审理权属大理院。这是赋予本市活力与生机的唯一源泉……”从经济角度讲，打击大理院，间接地打击了格勒诺布尔各阶层。此外，大理院自认为有义务维护外省的习俗和惯例。现在既然只有新设立的全权法院拥有登记权，那么王国的一般法律就有可能与多菲内省的习

俗相抵触。大理院进一步进行煽动，指责新设全权法院没有包括第三等级的代表。总之，大理院成功地煽起了全城乃至整个多菲内地区群众的情绪，群众成了大理院及其利益的捍卫者，因为他们感到中央政权侵害了他们的利益。5月20日，大理院有恃无恐，在—项抗议决议中表示拒绝屈服于“丑恶的专制主义”。这是一场决定格勒诺布尔市的未来，乃至生死存亡的斗争。

渐渐地，这一认识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一致的信念。德克莱蒙—托耐尔担心发生暴动，请求巴黎给予指示。上面的答复毫不含糊：必须镇压不屈服分子！驻军司令部可以使用密札流放大理院成员。6月7日晨，司令部收到密札。11时，这一消息在市内各地传开。检察官、律师等司法人员纷纷来到首席院长的府第。商店相继关闭，街上人群越聚越多，密探们开始在近郊出没。这一天是星期六，正值赶集的日子。附近村庄许多农民纷纷拥进城里。手工业工人、脚夫、帮工、流浪汉等小市民受司法界教士们的鼓动，发誓保卫他们的“保卫者”。在绿茵广场出售生菜和咸鱼的粗俗妇女们对着来往人群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在临格朗街的窗前，司汤达看到“一位老妇人手提一双破旧的鞋子，拼命地喊叫：‘我造反了！我造反了！’”

中午，—群妇女拥上钟楼，敲响了警钟。人们的口号十分明确：阻止法官们离开城市！人们很快在城市各入口处设置了路障。在幽静门，王军士兵与群众发生扭斗，有一个人的下腭被打伤。强行占领了首席法院院长住宅的妇女把马卸了套，把衣箱什物卸下车，阻拦院长的马车离去。不一会儿，其他法官的马车在格勒诺布尔妇女的监视下也到了这里。

面对骚动，德克莱蒙—托耐尔公爵自恃拥有两个团的兵力——澳斯特拉西亚团和王家海军团，发出了紧急集合令。但是士兵接到命令不许开枪，因为指挥官是个处事谨慎的外省人，他要避免出现不可挽回的局面，因此尽管个人安全受到威胁，他依然保持着镇静，没有动用部署在指挥部里的两连兵力。可是午后，群情激昂

的示威者开始向王军投掷石块，王军则以刺刀对付群众。年幼的昂利·贝尔此时看到了鲜血，从一位制帽工人身上流出的鲜血：“他的样子依然历历在目，鲜血的血从受伤的背下部大量流出……”

接着，一个消息传开了：在另一个街区，王家海军士兵违反命令，向周围人群开枪，打死了一人。被士兵追逐的暴动者翻墙上房，他们揭下屋顶的瓦块为武器，向士兵们投去。红色瓦块犹如雨注，挨打的王军领略了“格勒诺布尔行动的教训”。

全城有发生大屠杀的危险。手持斧头、镰刀、棍棒、镐头甚至枪支的农民通过城墙进入市区。一位老人和一个12岁的儿童在战斗中丧生。人们抬着其中一个人的尸体沿街示威。下午4时许，德克莱蒙—托耐尔公爵不得不屈服，他请求德贝吕勒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留下。当市府行政官员身着礼服（红色长袍和垂布）按通知来到公爵官邸时，人们冲进大门，占领了整座院落。公爵本人虽然安然无恙，但是他的地窖被洗劫一空，暴动随即演变成纵酒狂欢。

格勒诺布尔的法官们不无担心地看到，在他们点燃的这场熊熊烈火中，他们是有可能引火烧身的。他们把主动权交给了人民，而人民一旦起来就全然不顾了。暴动者要求敲锣打鼓，举行隆重仪式把法官们迎回法院。德贝吕勒先生出于尊严，谢绝了给予他的颇令其怀疑的荣誉，拒绝把用玫瑰花和月桂树枝编成的花环带在头上，也没有乘坐人拉马车，而是让兴高采烈的脚夫们挤坐在里面。这些身着长袍、头戴方形官帽的格勒诺布尔的先生们把事情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刻，这些尴尬的胜利者，在欣喜若狂的群众的簇拥下，正列队前进，强颜欢笑，无数鲜花从临街窗口撒下，全城钟声齐鸣，响彻四方。

入夜，烟花齐放，四处欢歌，一派节日气氛。深夜，城市复又平静下来，警察出动了，他们四处拣拾刚刚印刷的抨击传单，其醒目标题是：“救令精神”。传单的作者是格勒诺布尔一位年轻的律师巴纳夫^①。后来人们时常听到他的名字。

^① 安托万·巴纳夫（1761—1793），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显要政治人物。

二、维济耶精神

(1788年7月21日)

多菲内省3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不顾王权的警告和压力，在维济耶城堡召开会议。他们要求举行全国三级会议，以此反对大臣专权。巴黎中央政府不承认多菲内省三级会议的代表性，声称它是自相矛盾的。这无关紧要。运动一经发动，是不会立即停止的。

“宽宏大度的国王，请睁开你的双眼，”巴纳夫的抨击文章写道，“请看，你的卑微奴仆已把你的王国推向无底深渊，他们盗用你的名义，滥用攫取的非法权力，后果何等严重啊！”推崇国王，揭露大臣，这就是这篇革命准备阶段的文章的基调。不管是施展计谋，还是出于信念，人们后来仍不断地把善良的国王同独裁的政府相对立。但是，如果一个人尽管对国王不满，但还是采取宽容态度，那就说明他依然是个保王派。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改革者主张实行共和。人们是通过反对大臣来抵制国王的专制主义的。

那么巴纳夫（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类人）是否因此支持大理院的权利呢？他是否承认大理院代表人民？回答是否定的。这位受“英格兰”思想熏陶、活跃于法庭上的演说家，对于大理院先生们的傲慢，对于他们的特权等级思想，是了如指掌的。他当然希望按照五月敕令的规定，这些先生们仅限于履行“法官职务”。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大理院是唯一能够抵制国王专断的独立机构。

巴纳夫和他的好友、政治学导师穆尼埃^①一样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并且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通过三级会议为国家制定一部宪法。

“三级会议是唯一有效的药方，任何其它办法都只不过是掩盖和加深危机的权宜之计。”

为了对付国王的决定，法官们也在呼吁召集三级会议。在这一点上，巴纳夫等改革派成为穿袍贵族的盟友——至少暂时是这样。但是巴纳夫律师的文章远不是为了维护外省特权。他认为三级会议应该是各省一致协议的产物，是民族精神的胜利。“在我看来，使我们四分五裂的偏见是最为有害的，法国人的祖国应该存在于整个法兰西国土上。”这一思想当时仅是少数人的见解，王公贵族对它并不感兴趣，然而它却是有前途的。

况且，巴纳夫的主张尚不能为自己的同事接受。他们更乐于遵从命令，移居他乡，然而正是这一命令促使格勒诺布尔人起来造反。6月12日，在司法长官的同意下，他们悄悄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城市。6月13日，多菲内省首府市政委员会决定在市政大厅召开贵族代表会议。此时，反抗活动并没有中止，它们后来的鼓动者、组织者和代言人即是让-约瑟夫·穆尼埃。

这位30岁的格勒诺布尔人，是一个呢绒商的儿子。早年以律师为职业，但不久以后便出钱买了个一审法院王国法官职位。鉴于这种法院两年中仅有一年办案，穆尼埃得以有大量闲暇时间进行学习。他集中精力钻研英国公法，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其中最热心、最活跃的要算安托万·巴纳夫。穆尼埃为自己赢得了声誉，这使他在日后发生的事件中成为核心人物之一。然而穆尼埃的相貌冷峻，司汤达虽是他家的密友，却并不喜欢他：“在格勒诺布尔市立图书馆的一间大厅里悬挂着一幅表情呆板、身着法官制服的穆尼埃的肖像，这幅肖像虽然技巧很糟，却酷似他本人。他神情坚定，脑袋显得过分窄长

^① 让-约瑟夫·穆尼埃（1758—1806），法国政治家，曾任格勒诺布尔大理院法官，第三等级代表。

了。”穆尼埃看起来体弱多病，讲话声音粗暴，并且不停地眨着眼睛。他待人冷淡，根本谈不上拥有其弟子巴纳夫吹嘘的雄辩口才。但是穆尼埃博览群书，思维敏捷，任何时候都不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谬误中（读中学时，一次他在形而上学课的笔记本封面上写了“高深的迷雾”几个字，因此受到暂时除名处分）。他头脑清晰，无人能与之相比；他起草的动议、纪录和请愿书总是条理清楚，令人折服。“论精确程度，他象数学教员，论气魄，他象书报审查官，讲起话来满口警句格言。”6月14日会议就是由他定的调子。

在3位执政官的主持下，全体市政委员以及3个社会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约100多位“知名人士”开会讨论一份致凡尔赛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召回被放逐的法官，恢复他们的职务，因为一切问题都是由此引起的。此外，请愿书要求“允许召开各省三级会议”，为此，“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应与教士和贵族的代表人数相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要求召开王国三级会议，“以根除困扰国家的种种痼疾”。与会者还希望为贫民组织募捐，因为艰难时局造成了越来越多的贫民。最后，代表们拟在今后适宜时机召开全省三级代表会议。这样，反叛行动正在由格勒诺布尔市扩展到多菲内全省，现在已经不只是省府的贵族，而是全省人民发出抱怨，提出要求了。

政府见状不妙，立即向国王派驻多菲内省的专员下达了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各种会议的召开。总督和司法长官身体力行，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他们警告市政官员、主教和大主教不得轻举妄动，禁止各市市长和行政长官召集或主持会议。一场宣传战开始了。这场运动的鼓动者们无人甘心示弱。罗芒斯市市长德德莱·达吉埃在6月14日出席格勒诺布尔会议返回宅邸后，呼吁召开由120位显贵参加的特别会议。人们到处都在辩论，发表演说，进行鼓动。拉米尔镇的神甫在教堂里愤怒谴责“全权法院（根据五月敕令设立）玷污了国王的荣誉，违背了民

族的权利”。他抗议“流放法官”，反对“征收新捐税”。各种传单和小册子广为流传。巴纳夫在新起草的一篇颇具农民风格的文章中抨击设立全权法院“只不过是向我们征税”。

中央政权的代表是不会袖手让动乱进一步蔓延的。在尝试使用软的一手平息人们的情绪之后，他们动用了武力。6月28日，布列塔尼骑兵团进驻格勒诺布尔。当天晚上，德克莱蒙—托耐尔公爵以非法主持6月14日会议为罪名，软禁了两位首席执政官。密札命令把他们带到凡尔赛听候处理。6月30日，另外两名执政官和国王检察官接到命令，不许采取任何行动落实6月会议的各项决议。看来双方进行武力较量已经不可避免了，因为3个等级的成员决定7月2日在市府开会，讨论他们写给国王奏章的具体措辞。7月2日，会议如期举行，军事指挥官有意不加干涉，于是，与会者利用这一机会宣布7月21日召开“各市代表大会”。

在此期间，凡尔赛交替使用恫吓和拉拢两手策略，妄图阻止三级会议的举行。7月5日，内阁举行会议，宣布将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但是并没有确定任何日期。这种作法告诉人们必须提高警惕：凡尔赛可能在搞一场骗局。的确，凡尔赛又向佩剑贵族许诺说将恢复各省的三级会议。然而，它一方面表示抚爱，一方面又狠狠地打了人们几记耳光：罗芒斯市市长遭到逮捕并被投入建在阿格德沿海一个小岛上的布里斯库监狱；德克莱蒙—托耐尔被撤掉最高指挥官职务，由铁腕人物、令人望而生畏的德沃元帅取代。7月14日，援兵抵达格勒诺布尔，紧接着，德沃元帅在一团龙骑兵的护卫下，在夹道欢迎的步兵的欢呼声中，大肆张扬地进驻城里。

事实上，这种穷兵黩武只能吓唬胆小鬼。德沃元帅已经是一个体力耗尽、半截入土的85岁高龄的老人。部队的士兵也不再具有不久前屠杀起义者时的士气。当地的贵族与部队的指挥官实际上同属一个特权等级。所以，新任司令官对宣布召开的三级会议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议的组织者也不会放弃召开会议的